

辞书研究丛书

中国外语类辞书
编纂出版 30 年 (1978—2008)

回顾与反思

ZHONGGUO WAIYULEI CISHU

BIANZUAN CHUBAN SANSHI NIAN (1978—2008)

HUIGU YU FANSI

魏向清 耿云冬 王东波 著

辞书研究丛书

中国外语类辞书

编纂出版 30 年 (1978—2008)

回顾与反思

ZHONGGUO WAIYULEI CISHU

BIANZUAN CHUBAN SANSHI NIAN (1978—2008)

HUIGU YU FANSI

魏向清 耿云冬 王东波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 30 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

ISBN 978 - 7 - 5326 - 3297 - 8

I. ①中… II. ①魏… ②耿… ③王… III. ①外语—词典—编辑工作—概况—中国—1978~2008 ②外语—词典—出版工作—概况—中国—1978~2008 IV. ①H06②G239.2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961 号

责任编辑 徐祖友 王慧敏
助理编辑 刘宁静
封面设计 杨 阳

中国外语类辞书 编纂出版 30 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1 字数 332 000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297 - 8/H · 460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3—83349365

序

研读自己经历的历史的研究著作，研读者的评判总是严苛的，因为其中映现着自己的影子。正因为如此，如果研读者能够有所收获，进而有所感悟，那么这部著作便是成功的。魏向清教授领衔编写的《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 30 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便是这样一本著作。

这本书涉及的是 1978—2008 年我国 30 年间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作者在书中写道：“辞书的编纂出版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状况则可谓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与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风向标。”是为论。它像一支体温计，灵敏地度量出 30 年间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常温、高烧或低烧；还有各种人的情感：呐喊、悲愤、激昂、和谐、希冀，各种人间喜剧、悲剧和闹剧；它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公开的或隐晦的，正面的或反面的，诙谐的或无奈的，理想的或悲观的，日复一日地展现着、消逝着；在中国现有的出版体制下，外语类辞书出版的方式和内容，甚至词句的变动，都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征兆。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面前解剖这只小麻雀，相当于再次经历这段历史，但这次不再茫然，而是一种理智的对社会和生活真谛的解读。

这本书把我带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历史中，30 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险峰凸起，激流回旋，发生了多少起伏跌宕的交锋？每次交锋背后，又有多少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博弈？30 年，

相对于漫漫历史长河来说，实在短得只能称之为“一瞬”，但是如同其他领域，辞书编纂与出版业改革开放的30年，却也是瞬息万变，承载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与感悟。大量言之凿凿的事实、亲身经历的现场感、抽丝剥茧的思辨、高屋建瓴的视野，使本书产生了极大的阅读期待。

30年来的外语类辞书海量而纷繁，作者却理而不乱，在于作者设伏了框架理论的内在逻辑，并以“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方法引入研究，即阿尔都塞所说，“人们做出最富戏剧性的和艰难困苦的尝试，发现和领会最简单的生存行为如看、听、说、读的含义。这些行为使人们同他们的著作发生关系，而这些著作返回到人们自身，成为他们的‘没有出现的著作’”。因而，作者能够把历史性的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放置在一个水平和纵向的坐标轴上，站在社会文化形态的高度审视文本中的“症候”，以开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历史，才可能得出启示性的意见。

30年来的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史，不知被人梳理了多少遍。这本书我能够饶有兴趣地看下去，即在于它的分析角度新颖。这本书展现了辞书历史叙述在学术上迈出的创新一步。这一步不仅需要学理知识的积累和丰厚的历史资料，同时还需要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表达的智慧。

历史是不该被忘却的，无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即使不从学术角度评价，这本书对于中国辞书界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只有了解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才可能清晰地知道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看清方向，往前走得更加从容。

是为序。

张柏然

2010年12月20日夜

于南京龙江寓所

目 录

序 张柏然	001
绪 论	001
第一章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 30 年概述	018
第一节 英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回顾	022
一、英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总体成就	025
二、英语类辞书发展的主要问题	050
第二节 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回顾	059
一、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总体成就	062
二、非通用语种类辞书发展的主要问题	079
第三节 分析与思考	086
一、科学规划的意识	086
二、品牌国际竞争的意识	087
三、资源建设的意识	093
四、创新与合作编纂出版的意识	094

第二章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建设	095
第一节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国家规划	097
一、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概况	097
二、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成效与作用	110
三、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相关 规划的局限性	118
第二节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局部规划工作	122
一、主要外语类辞书出版机构的规划工作	123
二、主要外语类辞书出版机构的品牌培育工作	142
第三节 分析与思考	149
一、规划的目标应明确和科学	151
二、规划的安排应合理和稳妥	158
三、规划的实施应监控和协调	160
第三章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相关研究	161
第一节 外语类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	161
一、语言学理论发展与词典学本体研究	162
二、计算机技术进步与词典学新兴研究	182
三、跨学科的词典学拓展研究	200
四、双语词典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209
第二节 外语类辞书编纂的实践研究	222
一、向国外单语辞书的学习与借鉴	222
二、辞书编纂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228
三、辞书编纂的标准化	236
第三节 外语类辞书出版的相关研究	247

一、国家辞书出版的战略规划研究	247
二、辞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	255
三、辞书出版的专业化	263
第四章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进程	272
第一节 国外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影响	273
一、国外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273
二、国外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理论研究	280
第二节 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	281
一、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理论研究	281
二、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286
第三节 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318
一、“维基”时代辞书全媒体出版的技术支撑	319
二、“维基”时代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现代化的 构想	323
三、辞书编纂出版的“全媒体”化	327
第五章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的积极 影响	329
第一节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对汉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 促进	329
一、汉语类辞书编纂理论的现代化转向——以“汉语学习 词典”的发展为例	330
二、汉语类辞书编纂技术的现代化转向——现代语料库	

技术的应用	337
第二节 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对我国外语教学的 推动	340
一、词典介入下的外语教学策略的概念与现状	341
二、词典介入下的外语教学策略构建——以“英语词汇 教学”为例	342
结 语	350
主要参考文献	359
网络参考资料	368
附录 1 1975—1985 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 (草案)	370
附录 2 1988—2000 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391
附录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主要外语类辞书 研究相关著作及论文集概览	407
后 记	413

绪 论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代中叶以降一直延续着“盛世修典”的文化传统,字书有汉之《说文解字》,晋之《字林》,南朝之《玉篇》,宋之《类篇》,明之《字汇》、《正字通》以及清之《康熙字典》;而韵书则有隋之《切韵》,唐之《唐韵》,宋之《广韵》、《集韵》和明之《洪武正韵》等等,可谓硕果累累^①。我国这些古代辞书的编修充分体现了太平盛世的文化传承与历史积淀。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余年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延续。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1978 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它开启了此后 30 年里中国不断走向强大兴盛的新时期。在 1978—2008 年这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一点,我们从 2008 年各行各业进行 30 年发展成就回顾的热潮中便能找到无数有力的佐证,这“30 年”中呈现出种种日新月异的伟大变化与激动人心的快速发展景象。在这样一个快速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也同样走过了令人鼓舞与振奋的 30 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1978—2008 年间,中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变化之巨大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考察。首

^① 文中有关我国古代辞书及汉语辞书相关的学术内容及观点受到南京大学文学院鲁国尧先生的指点,特此致谢。

先,我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总量较前 30 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相关研究资料,“从 1949 年 10 月建国起,到 1979 年底,全国共出版了各类辞书 891 种……其中……外语语文辞书 103 种……”^①。相比之下,1978—2008 年这 30 年当中,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总量的增加是非常惊人的。从我们所做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来看^②,这 30 年我国编纂出版的外语类辞书总共有 6 624 部,和前 30 年相比增幅达 60 倍之多。更为重要的是,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所涉及的语种也增加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所涉及的语种非常有限,仅有英、日、俄、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语这 7 种。这一点,我们从 1975 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教育部联合写给国务院的《关于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报告中写道:“近几年来,新的词典出版不多,品种不全。现在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只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简明英汉词典》、《袖珍英汉词典》、《袖珍日汉词典》等少数几种。这些都是小型词典,收词较少,群众反映很不够用。特别是中文的大中型词典和英、日、俄、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几个主要语种的大中型词典,目前还没有。”^③但是,经过后 30 年的发展,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所涉及的语种覆盖面已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扩展,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主要包括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世界语、拉丁语、朝

① 方厚枢,“中国辞书编纂出版概况”,载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0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34 页。

② 指 2009 年 5 月至 2009 年 9 月由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中国辞书发展状况报告(1978—2008)”课题组所做的相关调研和统计数据。本书稿的写作所参考的全部辞书出版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基于“中国辞书发展状况报告(1978—2008)”课题组所做的相关统计数据,特此说明。

③ 《关于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75)出版字第 48 号]文件第 3 段。

鲜语、越南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缅甸语、印尼语、印地语、希腊语、泰语、挪威语、希伯来语、老挝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捷克语、蒙古语、克罗地亚语、瑞典语等 30 余种。此外,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种类也从前 30 年以语文辞书为主的较为单一的状况发展成为 30 年后包括语文辞书、专科辞书、专项辞书以及综合百科辞书等类别在内的辞书大家族,各主要类别本身也有了相对完备的类型体系。根据此次全面调研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1978—2008 年间编纂出版的外语类辞书主要可以分为 6 个大类(还可细分为 67 个小类),这比前 30 年的类别丰富了很多,更好地满足了我国广大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多层次、多元化的外语类辞书需求。

其次,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还体现在两次国家级辞书规划的制订与实施上。这两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主要是在 1978 年以后这 30 年内实施完成的。我国首次全国性的辞书规划(1975—1985)大体是在 1978 年以后得以充分实施,而且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也是在此期间很快推出并全面落实的。对我们本次调研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的外语类辞书规划均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且,伴随着两次大规模国家辞书规划的具体实施,外语类辞书的总体编纂出版受到了很大的推动,因而我们看到了两次国家级辞书规划实施期间,外语类辞书的出版总量与类别有了快速的增加。除了国家级层次的大规模辞书规划工作的有效推动和引导,各主要外语类辞书出版机构的规划工作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比如: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它们不仅大多积极参与国家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项目的具体实施,而且在各自的原创和引进系列外语辞书的项目开展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划意识,同时它们还在各自的外语辞书品牌培育方面陆续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

努力。这充分表明,1978年以后,我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划意识,而且各层次的规划制订与实施确实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30年当中有关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相关研究也有所进展,这为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第三,与新中国的前30年相比,1978年以来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外语辞书编纂出版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既包括专业外语辞书编纂团队和编辑出版力量的增加,也包括外语类辞书研究机构的陆续出现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产出。其中,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研究方面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最为突出,即双语词典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及博士后人才培养。具体来说,1978年以后,相继有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1988年)、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00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2001年)、厦门大学双语词典与双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翻译与词典学研究中心(2004年)、大连交通大学辞书研究所(2006年)以及上海海洋大学翻译与词典研究所(2008年)等以外语类辞书编纂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并陆续开始培养(双语)词典学方向的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而1993年的11月,也就是在中国辞书学会(1992年10月)成立之后仅一年,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便成立了。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术活动,从未间断,至今已召开了八届年会,而且每一届年会均有体现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相关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正式出版^①。可以说,这个全国性的专业委员会汇聚了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与研究的各类专

^① 第六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遴选了47篇参会论文,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以增刊形式在会前出版,并未再单独出版会议论文集。

门人才,为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专业化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得益于上述双语词典学研究中心(所)的成立与发展,特别是相应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实践的专业化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土壤。“据初步统计,三十年来共发表辞书学论文 12 000 篇”^①,而这方面,“我国在 1979 年之前……很落后……建国以后到 1979 年,发表了 399 篇(包括检字法的文章 78 篇)”^②。此外,1978 年以来,我国词典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也不断涌现,“据初步统计,本时期辞书学著作有七十余种”^③,而这其中涉及外语类辞书研究的相关成果就有不少。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1978—2008 年我国共发表外语类辞书学研究论文 2 768 篇^④,出版外语类辞书研究专著 46 部,其中通论性质 15 部,专论性质 31 部(具体书目请参见附录 3)。这些学术研究论文和专著反映和代表了我国外语类辞书研究方面的最重要成果。毋庸置疑,这一发展局面与新中国前 30 年的情况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致力于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专业机构与前 30 年相比也有大量增加。据《2007 年中国出版者名录(图书分册)》,我国大陆有 578 家图书出版社^⑤,其中出版范围涵

① 周荐等,“汉语辞书研究三十年回顾”,《辞书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2 页。

② 严庆龙,“新中国辞书事业三十五年”,载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5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

③ 周荐等,“汉语辞书研究三十年回顾”,《辞书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④ 1978 至 2000 年的外语类辞书学相关论文数据的统计主要基于《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190—259 页,第 273—277 页,第 282—284 页,第 347 页,第 352—354 页。2001 年至 2007 年的外语类辞书学相关论文数据的统计主要基于何华连、方宝花连载于《辞书研究》之上的“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1—2007 年),2008 年的外语类辞书学相关论文数据的统计主要基于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⑤ 据《中国出版》编辑部王运来编辑介绍,2010 年我国的出版单位已达到 580 家。但由于我们未能找到相关名录,因此,在本书的写作中依旧参照了《2007 年中国出版者名录(图书分册)》(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 ISBN 中心编,2007 年)。特此说明。

盖工具书出版的出版社有 259 家,出版范围明确写有编纂出版“辞书(词典、辞典)”的出版社有 46 家,而据我们的统计资料分析,改革开放 30 年当中,实际参与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出版机构多达 514 家,而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 30 年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 30 年期间,为了加快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专业化进程,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建立了辞书编纂出版准入制度和辞书编辑的专业资格认证体系。这些措施从国家政策和制度方面很好地推动了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专业化发展。

第四,1978 年以来的 30 年间,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全面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进程也不断推进,令人鼓舞。这方面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理念迅速普及上,更体现在相关现代化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与完善上。1992 年,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率先探索用于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语料库及计算机辅助编纂平台的研发,1995 年至 1997 年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共建的 CONULEXID 语料库及双语词典编纂平台系统研发成功,1998 年投入《新时代英汉大词典》项目的应用中,取得了一项标志性成果,即《新时代英汉大词典》这部首次基于自创英汉语料库和独立研发的双语词典编纂平台进行编纂的大型英汉双语学习型词典在 2004 年出版。此后,我国多家词典学研究中心或计算机研究机构均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也陆续有不同形式的成果问世。由于计算机技术以及语料库的应用,我国在外语类辞书编纂领域率先初步实现了辞书编纂的计算机(辅助)化,开始告别传统的辞书编纂模式与方法,逐步与国外先进的现代辞书编纂模式接轨。所以说,我国辞书编纂现代化与标准化的真正起步是从外语类辞书编纂领域开始的。同样,由于计算机技术和语料库的应用,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质量和效率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质量而言,主要体现在双语词典的配例方面。我国自主开发和建设

的英汉语料库使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开始逐步摆脱了对英语蓝本词典的完全依赖,词典编纂者在语料选取方面的自主权有了根本的资源保障,因此,也就更能体现双语词典编者在编纂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就编纂效率来说,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进程还给词典编纂出版以及修订周期的缩短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基础。举例来看,事实上,《新时代英汉大词典》这部篇幅达 1 200 万字的大型英汉学习型词典能够在短短 6 年时间内编纂完成并正式出版,语料库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功不可没。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已经开始迈向了现代化之路,数字化编纂出版的普及势在必行。

谈到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不能不为电子辞书和在线辞书在中国的方兴未艾而感到兴奋。正如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张柏然教授曾形象比喻的那样,我国的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已经走出“火与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光与电”的现代模式,同时已经开始迈入“网与天”的未来发展中。1983 年世界上最早的掌上电子词典诞生,我国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了掌上电子词典的研发,而且在 1990 年便开始了相关产品的生产。“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掌上电子词典得到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二十多家公司涉足掌上电子词典的研究或生产。”^①如今,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掌上电子词典在相关技术与功能设计、产品创新与品牌类型以及用户普及等方面都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成为外语类辞书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或者说是主流载体。除了掌上电子词典,我国外语类电子辞书的发展还体现在光盘版和网络版词典上。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我国的光盘版和网络版电子辞书的探索与尝试也紧跟欧美形势,特别是港台地区,更是走在了前面。到目前为止,

^① 章宜华,《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165 页。

我国外语类光盘版电子辞书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和进步。而在在线电子词典的发展方面,也是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我们看到了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的一个个词典门户网站,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现在,我们能很容易地在互联网上找到很多各具特色的外语类电子词典网站,大大方便了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近期,随着我国3G手机技术的日新月异,手机版电子词典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广大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又有了一种更为便捷的电子辞书载体。简而言之,1978年以来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进程完全可以折射出我国日益加快的现代化发展步伐。我国辞书事业的兴旺发达显然是离不开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

第五,我国这30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长足进步也离不开相关辞书编纂标准的制定。归根结底辞书是满足人们语言文化认知需求的文化产品,其质量的保证得益于相关国家标准的制订与推广实施。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在1978年以后的30年当中逐步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而陆续开展起来的。“我国辞书编纂的标准化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6年4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①该委员会所开展的标准制订工作一般都能够兼顾汉语类和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实际需求,通常能够邀请来自汉语辞书和双语辞书界的专家学者,大家共同研讨并制订了一些重要的辞书国家标准,如:“GB/T 11617—2000《辞书编纂符号》、GB/T 15238—2000《辞书编纂基本术语》和GB/T 19103—2003《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等。在这些标准的研讨与制订过程中,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很多关键性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对这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质量标准掌控的导向作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2008

^① 周荐等,“汉语辞书研究三十年回顾”,《辞书研究》2009年第5期,第6页。